

# 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

孟原召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十分兴盛, 除窑址所见残次废品外, 其产品在国内发现较少, 而在东南亚、日本等国外遗址以及运销海外的途中常有出土。据此可知该地所产瓷器主要是外销。这些外销的瓷器以碗、盘、盒等生活用器为主, 也有军持、瓶等其他品种。根据海外遗址的考古发现, 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 我们得知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诸国、日本, 乃至中东、非洲东海岸地区。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大量外销是离不开当时国外社会生活状况、泉州瓷器仿烧名窑产品的适应性以及泉州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盛的便利条件这三个前提的。

**关键词:** 宋元时期 泉州沿海地区 瓷器 外销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泉州地区地势西高东低, 西部为戴云山余脉, 逐渐向东南过渡到泉州平原, 一直延伸到东部海湾<sup>[1]</sup>。这一地区陶瓷原料丰富, 取用方便<sup>[2]</sup>; 另一方面, 瓷器产品可随晋江顺流而下, 到达泉州港。宋元时期泉州港贸易发达, 海上交通便利<sup>[3]</sup>, 可达澎湖、日本、东南亚等地。因此, 这一地区具备了陶瓷生产的两大基本要素——原料和交通<sup>[4]</sup>, 经过南朝至隋唐五代制瓷手工业的发展, 到了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极为兴盛<sup>[5]</sup>。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 分布于泉州沿海地区的许多窑址得以发现, 部分做了科学发掘<sup>[6]</sup>, 为我们了解泉州沿海地区制瓷手工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sup>[7]</sup>。通过我们对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的综合分析考察<sup>[8]</sup>, 可知这一时期泉州陶瓷大量生产, 表明其具有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关于泉州地区瓷器消费市场, 许多学者一般认定为“外销”<sup>[9]</sup>, 其中以晋江磁灶窑<sup>[10]</sup>、南安南坑窑<sup>[11]</sup>为代表, 近年一些学者比较系统地从陶瓷生产<sup>[12]</sup>、消费市场<sup>[13]</sup>、水下考古发现<sup>[14]</sup>、产业模式<sup>[15]</sup>等角度论证了泉州陶瓷的外销。

本文将从市场的角度分析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生产与销售中的的外销性质、品种、地区、原因等问题。

## 一 外销性质的论证

中国古代瓷器使用十分普遍, 并且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作为商品输往国外<sup>[16]</sup>。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的消费市场一直是该地制瓷遗存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许多学者都对其比较关注并做出了外销的判断<sup>[17]</sup>。这可以通过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的发现情况两个角度来论证, 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 古代文献的记载。

这在当时外国人的游记以及宋元人在东南亚等地见闻中都有所体现<sup>[18]</sup>, 有的还明确指

出是泉州所产瓷器。这就表明，泉州沿海地区所产瓷器存在着海外市场。

第二，除了窑址废弃物之外，国内考古发现的资料较少。

建国后，泉州各地墓葬、城市遗迹的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进展<sup>[19]</sup>。泉州城址的考察为我们了解宋元时期泉州城概况提供了依据<sup>[20]</sup>，一些遗址中出土了泉州沿海地区生产的青瓷、青白瓷残片，如泉州体育场<sup>[21]</sup>、府后山“宋文化堆积层”<sup>[22]</sup>、晋江溥济庵遗址<sup>[23]</sup>等，特别是府后山遗址出土大量瓷片中“以本地窑的产品为多”，泉州德济门遗址也出土有宋元时期瓷器 30 余件<sup>[24]</sup>。此外，泉州地区宋元时期的墓葬发现不多，有南安火葬墓<sup>[25]</sup>、厦门宋墓<sup>[26]</sup>等，一般没有瓷器随葬或者数量极少，其制作大多草率，属本地产品。这就说明泉州沿海地区的瓷器产品部分是用于当地使用的<sup>[27]</sup>。

泉州以外，周围其它地区宋元时期的生活居址和墓葬<sup>[28]</sup>，包括闽南其它地区如漳州<sup>[29]</sup>，闽东的福州<sup>[30]</sup>，闽北地区如邵武<sup>[31]</sup>、将乐<sup>[32]</sup>、南平<sup>[33]</sup>、建瓯<sup>[34]</sup>等，闽西地区有三明<sup>[35]</sup>、尤溪<sup>[36]</sup>等地，出土瓷器也较少，但这些地区都有相应的瓷器生产<sup>[37]</sup>，并且器物特征上可看出多是当地所产<sup>[38]</sup>。相对而言，内地的其它地区更是不具备这种瓷器使用市场<sup>[39]</sup>。因而，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并不存在广阔的内销市场。

根据上述，除了窑址堆积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窑业废弃物之外，国内遗址中考古发现的瓷器资料并不多，这显然与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是不符的。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第三个方面来解决。

第三，海外一些地区和水下考古沉船遗迹中同类瓷器的大量发现。

1974 年，在泉州市东南郊的后渚港，发现了一艘宋代远洋海船<sup>[40]</sup>，出土了一些泉州地区生产的划花青瓷以及磁灶窑粗瓷。泉州法石宋代沉船出土有南宋时晋江磁灶窑大量烧造的小口瓶以及泉州划花青瓷<sup>[41]</sup>。此外，近年来泉州港码头的清理<sup>[42]</sup>，出土了大量宋元时期瓷片，从特征来看，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泉州沿海地区。这些沉船、码头出土的瓷器不仅为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泉州港贸易发达的佐证。

近年来，在东亚的日本<sup>[43]</sup>、东南亚的菲律宾<sup>[44]</sup>、新加坡、印度尼西亚<sup>[45]</sup>等地都发现了许多泉州地区划花青瓷器、磁灶窑瓷器等<sup>[46]</sup>。这不仅表明泉州沿海地区瓷器外销的事实，也是外销市场的充分证据。

随着水下考古的兴起和发展，许多溺于海底的沉船及大量遗物陆续出水<sup>[47]</sup>。在西沙群岛<sup>[48]</sup>、东南沿海海域<sup>[49]</sup>等出土了大量的具有泉州特色的青白瓷器、青瓷器<sup>[50]</sup>；国外一些海域也发现了一批出有泉州沿海瓷器的沉船<sup>[51]</sup>。这也是泉州沿海地区瓷器外销及其贸易航线的证明。

因此，从泉州港遗迹、海外瓷器的发现以及航线上大量泉州瓷器的出水这几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海外市场是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重要消费地。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证，我们可以证明泉州沿海地区瓷器除了满足当地需要外，还大量销往海外。进一步说，当地市场并不是泉州瓷器的主要市场，更不用说内销了，而海外市场才是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的主要销售市场。这就论证了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性质，也是下面有关外销和市场问题展开论述的基础。

## 二 外销瓷器品种和类别

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的生产情况，基本上也就代表了外销产品的概况。事实上，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要根据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窑产品的品种和类型，而且还要结合被证实了的海外发现的属于泉州地区生产的瓷器类别。

泉州沿海地区瓷器产品大多属于生活用瓷，这些品种在海外几乎都有发现，是外销瓷器的主要类别<sup>[52]</sup>。这里包括两类产品：一是比较普通的生活用瓷，这在当地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有碗、盘、碟、盒、执壶、罐、瓶等；二是当地甚至国内极少使用、专门用于外销的品种<sup>[53]</sup>，如军持<sup>[54]</sup>、大罐等。此外，不同时期的外销瓷器品种和类型也有差别，结合海外发现分别说明。

北宋早中期，泉州沿海瓷器生产的重点在晋江磁灶窑，瓷器品种主要有青釉瓷、酱釉瓷、黑釉瓷等，器类以执壶、罐、小罐、碗、盘等为主，这便构成了这一阶段泉州外销瓷器的品类。这些器物大多受到越窑青瓷风格的影响，属于越窑青瓷海外市场的补充<sup>[55]</sup>。

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仿越青瓷继续烧造，青白瓷大量烧造。外销瓷器的瓷器品种由以越窑风格的青瓷为中心而转向以仿景德镇青白瓷系统和越窑青瓷系统为主的多类瓷器，包括青白瓷、青釉、酱黑釉、酱釉、黑釉、素胎无釉瓷等，器类基本与北宋早中期相似，碗、盘、盒类器物为大宗。

南宋中晚期，这是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十分活跃的一个阶段。青白瓷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已经不如前一期，磁灶窑粗瓷系统中则有较多的酱黑釉、素胎无釉、彩釉等品种，器类则有碗、盘、盒、罐、执壶、净瓶、小口瓶、军持等。最引人注目、在海外发现最多的则是南安等地生产的篔点划花青瓷碗、盘类器物，这类仿自龙泉窑的青瓷，形成了庞大的系统，在西沙群岛<sup>[56]</sup>、南海沉船<sup>[57]</sup>以及澎湖<sup>[58]</sup>、日本<sup>[59]</sup>诸多遗址中时常发现。

元代泉州制瓷业较之发达的南宋时期略显收缩。外销产品中以磁灶窑粗瓷和制作粗劣的篔点划花青瓷为主，包括黑釉、白釉、白釉剔花、黑釉剔花、彩釉、釉下彩绘瓷、素胎瓷等，还有少量青白瓷。器物类别有碗、盘、盆、盒、罐、大罐、小罐、军持等。

据此我们可得知，泉州沿海地区外销瓷器的品种和类别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表一），而这种销售情况的变化正是该地区制瓷手工业生产中阶段性特征的具体反映。

表一 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和类别简表

时期	外销瓷器系统	品种	类别
北宋早中期	仿越窑青瓷	青釉瓷、酱釉瓷、黑釉瓷等	执壶、罐、小罐、碗、盘等
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	仿越青瓷、仿景德镇青白瓷	青白、青、酱、黑等釉	碗、盘、盒类为大宗
南宋中晚期	仿龙泉青瓷、青白瓷、磁灶窑粗瓷	篔点划花青瓷、青白瓷、彩釉等	碗、盘、盒、罐、小口瓶、军持等
元代	磁灶窑粗瓷、篔点划花青瓷为主	黑釉、白釉、彩釉、青釉等	碗、盘、盆、盒、罐、军持、瓶等

### 三 瓷器销售地区及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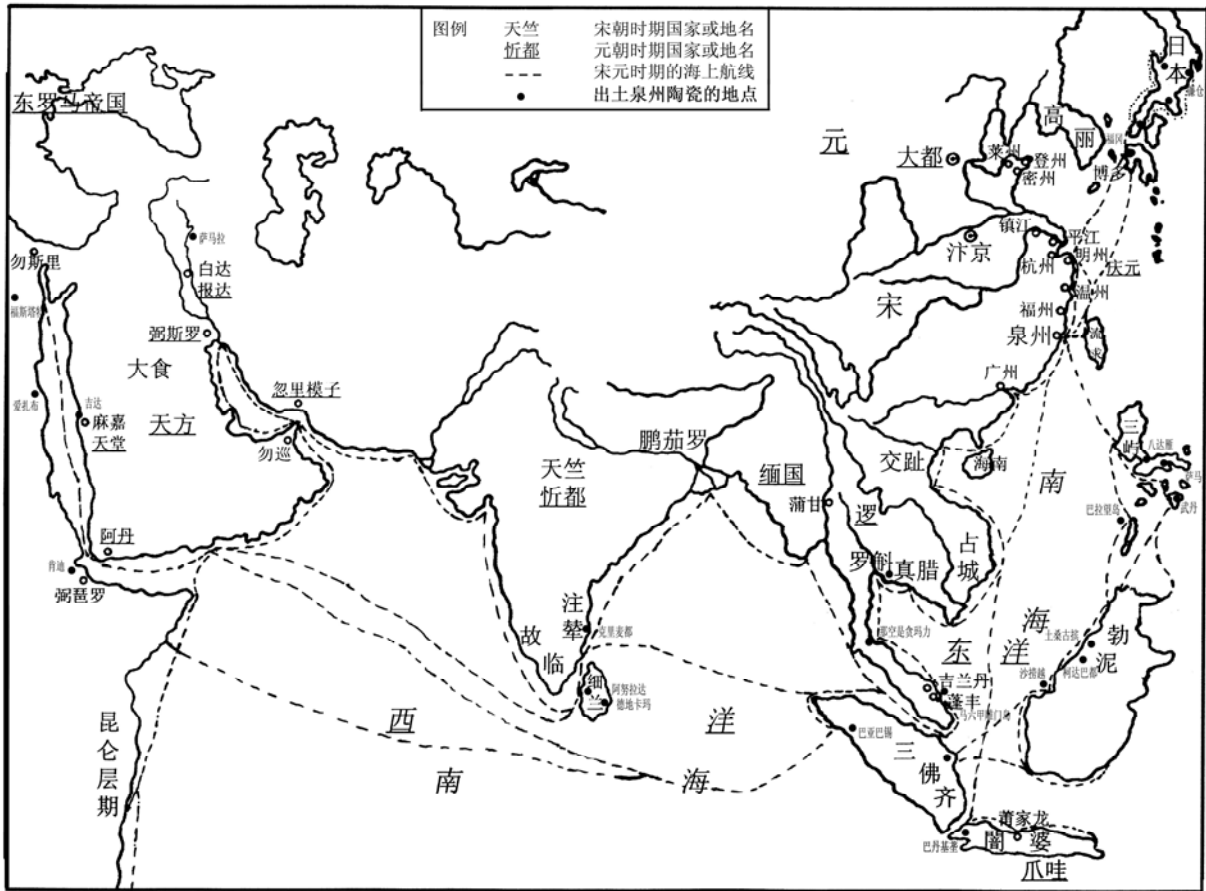
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销售地区与前面外销性质论证、外销瓷器品种和类型等密切相关，是外销问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海外遗址的发现和水下考古的成果，结合文献记载，我们还可以从中复原当时贸易的路线（图一）。

#### 一、销售地区

泉州瓷器在海外的发现很多，主要有东亚、东南亚，直到中东地区、非洲东海岸，尤以

图一 宋元时期泉州港海上航线示意图

(据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



日本<sup>[60]</sup>和东南亚<sup>[61]</sup>最多。日本出土的泉州瓷器分布在博多<sup>[62]</sup>、福冈<sup>[63]</sup>、镰仓<sup>[64]</sup>等港口遗址，出土有磁灶窑粗瓷系统瓷器、篋点划花青瓷、青白瓷，而以篋点划花青瓷居多，器类有碗、盘、执壶、罐等。东南亚的菲律宾<sup>[65]</sup>、印度尼西亚<sup>[66]</sup>、泰国<sup>[67]</sup>、马来半岛<sup>[68]</sup>等地均有发现，其中以磁灶窑瓷器居多，军持、大罐、小罐、净瓶等属于这些地区富有特色的典型外销器类，而同一遗址中发现的其他窑址则较少，泉州地区窑址是其主要的瓷器来源。伊拉克、伊朗等中东国家<sup>[69]</sup>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埃及<sup>[70]</sup>等地也有泉州瓷器的发现，数量不多，与同一遗址发现的其他瓷器相比明显不占主要地位，如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

此外，澎湖列岛<sup>[71]</sup>、琉球群岛等东部海域也有大量泉州瓷器的出土。

## 二、销售路线

宋元时期泉州是重要港口之一，造船业和航运、贸易十分发达。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宋代在原来航线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些较为快捷、航行更远的路线，这就为中国物质文化的向外进一步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前提。瓷器便是属于众多商品中重要的一类。国外这些遗址的发现，也重现了宋元时期以泉州港为出发点的瓷器运销路线，大致有三条航线。

第一条，东向航线，由泉州出发，向东航行，到达台澎地区<sup>[72]</sup>，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泉州瓷器的重要中转站和消费地之一。这可从东海海域发现的沉船及大量瓷片中得到进一步证明。这条航线航程较短，可作为更远航线的中转站，由此进一步到达日本、菲律宾等地。

第二条，北向航线，由泉州港出发，向北沿近海航线至明州（庆元）一带，短暂停留之

后，继续向东北航行至日本诸岛<sup>[73]</sup>。

第三条，南向航线，这也是航程最远、最为复杂的航线<sup>[74]</sup>。由泉州港出发，向南航行，有的船只先经广州作短暂停留，然后出发到达菲律宾、越南，继续南行，至西南到达苏门答拉岛、爪哇岛、沙捞越等各地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南部港口或直接向西航行，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城市<sup>[75]</sup>，进而分散到非洲、中东各地。

随着打捞技术的进步和水下考古工作的展开，中国沿海海域尤其是南海、东南亚诸岛附近海域等地发现了一些宋元时期的沉船<sup>[76]</sup>，出土了大量瓷片，许多都是可以同宋元时期泉州沿海窑址相对应的，进一步说明了宋元泉州瓷器外销的海上路线。

#### 四 外销原因的探讨

中国古代瓷器在国外颇受欢迎，汉晋时期已有外传<sup>[77]</sup>，到了唐代出现了作为商品销往海外的外销瓷器<sup>[78]</sup>，宋元时期瓷器的外销更是极为发达<sup>[79]</sup>。一方面，这是受到中国瓷器普遍使用的影响，是瓷器的实用性优势所决定的<sup>[80]</sup>。另一方面，与国外当时的社会背景、海外贸易的发达都有很大关系。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还与泉州港的便利密不可分。下面便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地区宋元时期瓷器的外销原因。

第一，中国瓷器适应了当时国外的社会生活方式。

瓷器的普遍流行，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sup>[81]</sup>，而且对国外的社会生活也有较大的影响。

唐、五代时期，越窑、长沙窑<sup>[82]</sup>、巩县窑等南北方瓷器已远销海外<sup>[83]</sup>。这类物美价廉的瓷器改变了国外以陶器、竹木器、金属器皿为主的生活习惯，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批瓷器的输出，刺激了宋元时期这些地区乃至更多地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

中国的宋元时期，东亚<sup>[84]</sup>、东南亚<sup>[85]</sup>、南亚、中东、非洲<sup>[86]</sup>等地，社会生产比较落后，生活习俗也有较大差异<sup>[87]</sup>。在此基础上，其生产水平有限，与中国发达的制瓷手工业根本无法相比<sup>[88]</sup>。即使是制陶工艺水平较高的阿拉伯、日本地区<sup>[89]</sup>，也尚未掌握成熟的烧瓷技术<sup>[90]</sup>。因此，中国的瓷器便极大地适应了国外的生活方式，也为大量瓷器的输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是中国瓷器包括泉州瓷器能够外销的社会背景和外部因素。

第二，以仿烧宋元时期著名外销名窑为主要特征的泉州沿海地区瓷器适应了国外对瓷器品种和类别的需求。

宋元时期，中外之间的瓷器贸易十分发达。一些著名窑场生产瓷器都存在着海外市场<sup>[91]</sup>，主要有北方的磁州窑<sup>[92]</sup>、定窑、耀州窑等，南方的越窑、龙泉窑<sup>[93]</sup>、景德镇窑等<sup>[94]</sup>。在这些主要窑场的影响下，各地还有许多生产类似瓷器的小型窑场，共同构成了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生产格局<sup>[95]</sup>，也是外销瓷生产体系的基础。

通过前文我们对泉州沿海地区宋元制瓷业的分析，可知其主要以仿烧著名外销名窑为特征。名窑瓷器开辟了国外市场，但又供不应求或成本高，给泉州沿海地区仿烧名窑瓷器提供了机会。因此，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生产，从器物类型、装饰特征等方面对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等进行模仿，在一般的器物品种和类别上，该地所产瓷器适应了国外的具体要求。这是泉州瓷器能够成为外销产品的一个内在因素。

此外，泉州沿海地区还生产一些器形独特的瓷器，如军持、龙纹大罐、小罐等，这类器物明显带有异域特色，是泉州为迎合海外市场需求而专门生产的用于外销的一类瓷器。这更是外部需求对内部生产具有适应性的有力反映。

第三,以泉州港为中心的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盛为泉州瓷器的外销提供了运输的便利条件。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达<sup>[96]</sup>,明州<sup>[97]</sup>、温州<sup>[98]</sup>、广州<sup>[99]</sup>、泉州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港口。泉州港便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兴起,到宋元时期达到空前繁荣<sup>[100]</sup>,属于“东海航路和南海航路之间的重要港口”<sup>[101]</sup>。泉州城经历代变迁<sup>[102]</sup>,于宋代元祐二年(1087)设立市舶司<sup>[103]</sup>,负责海外贸易,“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sup>[104]</sup>,并每年举行“典礼”——刻石祈风<sup>[105]</sup>,鼓励海外贸易。南宋政府为“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由市舶司提举主持“犒设诸国蕃商”<sup>[106]</sup>,使得大批海外蕃客的定居<sup>[107]</sup>,建立圣墓与清真寺<sup>[108]</sup>,促进了泉州城的繁荣<sup>[109]</sup>,带动了泉州港与国外海上贸易的活跃<sup>[110]</sup>。

造船技术的进步是海外贸易发达的一个客观条件<sup>[111]</sup>。宋元时期中国海船有福船等四种<sup>[112]</sup>,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尤其是福船,适宜于远洋航行,泉州湾发现的宋代海船即属于这类,该船尖底,为双桅帆船,结构坚固,规模庞大<sup>[113]</sup>。

海外贸易是以商品为纽带的,瓷器无疑是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产品,而泉州沿海地区窑址靠近贸易繁荣的港口,这为瓷器的外销节省了生产和运输成本。因此,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成熟的基础上,以泉州港为中心海外贸易的繁盛是宋元时期泉州瓷器外销的技术前提和客观条件。

## 五 瓷器产品的市场导向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十分繁荣,瓷器与茶叶、丝绸等是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连同输入的香料<sup>[114]</sup>、珠宝<sup>[115]</sup>等共同开辟了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sup>[116]</sup>。在这些贸易商品中,陶瓷的数量大、普及范围广,地位重要,因此有学者称之为“陶瓷之路”<sup>[117]</sup>,而发达的泉州沿海地区宋元瓷器在这条道路上占有一席之地<sup>[118]</sup>。

在此贸易背景下,结合前文的多角度分析,我们可知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的发展明显受到市场需求的较大影响。一方面,泉州沿海地区的仿烧瓷器,特别是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风格几类瓷器,本身就是以海外广阔的市场空间而扩大生产的。另一方面,许多器物是专门为这些地区“量身定做”的,是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品种。因此,在海外需求市场的导向下,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外销瓷器的生产蓬勃发展。

市场对瓷器的影响又是具体的,包括器物类别、造型、釉色、装饰等,泉州地区许多具有异域风格的瓷器体现了市场需求这一消费层面。

附记:本文为笔者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权奎山教授、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栗建安先生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1] 据高秀静主编《福建省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1月。
- [2] 张锡秋、胡立勋《福建省陶瓷原料考察纪实及其发展的探讨》,《中国陶瓷》1987年4期,10-18页。
- [3] 宋元时期泉州港贸易极为发达,其盛况可在当时史书及外国人游记中得以见证。
- [4] 权奎山《试论南方古代名窑中心区域移动》,《考古学集刊》第11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月,276-288页。
- [5] 本文所要论及的泉州沿海地区,乃主要是指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包括南安、晋江、惠安、安溪、同安等几地。德化窑位于德化县,德化的行政归属在宋元时期虽属泉州,但其主要瓷器产品为德化白瓷,尤其是到了明代,更是制作精致,以“中国白”闻名于世,这一点与泉州沿海地区的瓷器面貌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故此可单独另论。因此，本文所论不包括德化窑。

[6] a. 粟建安《福建古瓷窑考古概述》，载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175-181页。

b. 粟建安《福建古窑址考古五十年》，载《陈昌蔚纪念论文集·陶瓷》，臺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1年5月，9-38页。

[7] a. 叶文程、林忠干著《福建陶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b. 曾凡著《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6月。

c. 郑东《福建闽南地区古代陶瓷生产概况》，《东南文化》2002年5期，56-62页。

[8] 孟原召《泉州沿海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遗存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

[9] a. 李知宴、陈鹏《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陶瓷输出》，《海交史研究》1984年总第6期，39-48页。

b. 林文明《泉州陶瓷外销问题的探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7月，71-79页。

c. 许清泉《宋元泉州陶瓷生产与外销》，《古陶瓷研究》第一辑，80-87页。

d. 陈鹏《宋元时期泉州陶瓷业与产品外销》，载陈世兴主编《泉州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359-375页。

[10] a. 叶文程《晋江泉州古外销陶瓷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1期，105-111页。

b. 叶文程《福建晋江县古外销陶瓷探讨》，载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1月，84-89页。

c. 叶文程、苏垂昌、黄世春《晋江磁灶窑的发展及其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11月，61-65页。

d. 黄世春《晋江古代陶瓷业与海外交通》，《福建文博》2000年1期，78-81页。

[11] 杨小川《南安市篦点划花青瓷介述》，《福建文博》1996年2期，169-172页。

[12] Ho Chuimei: The Ceramic Boom in Minnan during Song and Yuan Times,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1, pp.237-282.

[13] (日)坂井隆《東南アジア群島部の陶磁器消費者》，《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3月，159-249页。

[14] a. 粟建安《从水下考古的发现看福建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2001年1期，98-106页。

b. 粟建安《福建陶瓷外销源流》，《文物天地》2004年5期，12-22页。

[15] 苏基朗《两宋闽南、广东、浙东外贸瓷产业空间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载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城市工业化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141-192页。

[16] 这涉及到“外销陶瓷”的概念问题。中国陶瓷的外传可以上溯到汉晋时期；但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外销陶瓷是指批量销往海外的具有商品性质的陶瓷，始自唐代。

a. 唐星煌《汉晋间中国陶瓷的外传》，《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3期，106-110页。

- b、唐星煌《汉唐陶瓷的传出和外销》，吴锦吉、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1996年12月，137-148页。
- c、苏垂昌《唐五代中国古陶瓷的输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2期，93-101页。
- d、李知宴《从唐代陶瓷的发展看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总第7期，53-61页。
- [17] a、许清泉《宋元泉州陶瓷生产与外销》，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7月，80-87页。
- b、陈鹏《宋元时期泉州陶瓷业与产品外销》，载陈世兴主编《泉州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359-375页。
- [18] 具体记载参看本文研究史中有关古代文献记载部分。
- [19] a、庄为玠《宋元明泉州港的中外交通史迹》，《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1期，96-124页。
- b、庄为玠《谈最近发现的泉州中外交通的史迹》，《考古通讯》1956年3期，43-48页。
- c、庄为玠《续谈泉州港新发现的中外交通史迹》，《考古通讯》1958年8期，62-64页。
- d、林惠祥《一九五〇年厦门大学泉州考古队报告》，《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1期，140-156页。在晋江城内中山公园一带，有宋代青瓷双层碗的发现。
- [20] a、庄为玠《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载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367-379页。
- b、庄景辉《泉州子城址考》，《福建文博》1987年2期，159-164页。
- c、庄景辉《泉州罗城址考》，载庄景辉著《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19-36页。
- [21] 庄为玠《浙江龙泉与福建的土龙泉》，载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4月，177-181页。文中提及“土龙泉”瓷片。
- [22] 陈鹏、曾庆生《泉州府后山出土的江西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4期，73-77页。该遗址堆积中所出土瓷器“以本地窑的产品为多，外地窑的产品也不在少数，属本地窑的产品有德化窑、晋江的磁灶窑、同安汀溪窑、泉州东门窑、安溪窑等等。属外地窑口的有福建建阳水吉窑、浙江龙泉窑、河北磁州窑、江西吉州窑、景德镇窑等”（本文73页）。
- [23] 吴金鹏《晋江溥济庵遗址出土的瓷器及相关问题》，《福建文博》2000年1期，36-41页。
- [24] 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物局《泉州德济门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3年2期，14-40页。
- [25] a、泉州市文管会、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南安发现宋代火葬墓》，《文物》1975年3期，77-78页。
- b、陈家榭《福建省南安潘山乡发现元代骨灰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2期，183页。
- [26] a、郑东、周翠蓉《福建厦门发现宋代纪年墓》，《南方文物》2000年2期，6-8页。
- b、叶文程《厦门岛首次发现宋代火葬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82页。
- c、厦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厦门市文化局编《厦门文物志》，第三章《墓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6月，65-68页。

[27] 本文这一部分虽以“外销”为题，但并不否认和排除泉州沿海瓷器的国内市场（其实主要是当地）。一方面国内出土数量较少（出土地点文中已有所述），另一方面欲突出该地区瓷器的外销，因此这里主要讨论海外市场。

[28] a、栗建安、郑辉《福建宋元考古概述》，《福建文博》2002年2期，75-93页。

b、林钊《福建省四年来古墓葬清理简况》，《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期，67-68、70页。

c、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福建省古墓葬发掘资料汇编》，油印本，1959年。

[29] a、福建省博物馆、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漳州银都大厦工地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1年1期，23-32页。

b、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松柏山唐宋墓葬》，《福建文博》2003年2期，8-13页。

[30] a、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1999年福州华林横巷古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3年3期，29-37页；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北大路外九彩巷古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3年3期，38-52页；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嘉华新城古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3年3期，53-67页；福建博物院、福州市考古队《1998年北大路华富花园工地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3年1期，40-47页。

b、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7期，1-17页；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清理南宋朱著墓》，《考古》1987年9期，796-802页；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10期，22-33页；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3月。

[31] 福建省博物馆、邵武市博物馆《邵武四都宋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1年1、2期，67-71页。

[32] 福建省博物馆、将乐县文化局、将乐县博物馆《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1期，32-36页。

[33] a、张文崑《南平大凤店口宋墓》，《福建文博》1989年1、2期，18-22页。

b、张文崑《福建南平店口宋墓》，《考古》1992年5期，428-430页。

c、张文崑《福建南平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12期，33-37页。

d、南平市博物馆《福建南平市西芹镇宋墓》，《考古》1991年8期，722-726页。

e、张文崑、林蔚起《福建南平市三官堂元代纪年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6期，48-51、81页。

[34] a、张家、徐冰《福建建瓯县水南宋元墓葬》，《考古》1995年2期，188-190页。

b、建瓯市博物馆《福建建瓯市迪口北宋纪年墓》，《考古》1997年4期，73-75页。

[35] a、余生富《三明莘口宋墓》，《福建文博》2001年2期，77-79页。

b、福建省博物馆、三明市文管会《福建三明市岩前村宋代壁画墓》，《考古》1995年10期，909-914页。

[36] a、杨琮、林玉芯、王祥堆、朱世武《尤溪宋代壁画墓综述》，《福建文博》1991年1、2期，84-90页。

b、福建省博物馆、尤溪县文管会、尤溪县博物馆《福建尤溪城关宋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4期，71-75页。

- c、陈长根《福建尤溪县城关镇埔头村发现北宋纪年壁画墓》，《考古》1995年7期，668-671页。
- d、福建省博物馆、尤溪县博物馆《福建尤溪发现宋代壁画墓》，《考古》1991年4期，346-351页。
- [37] a、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6月。
- b、林忠干、王治平、卢保康《闽北宋元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海交史研究》1987年2期，12-19页。
- [38] a、林忠干《福建五代至宋代墓葬出土明器神煞考》，《福建文博》1990年1期，50-54页。
- b、林忠干《福建宋墓分期研究》，《考古》1992年5期，456-463、427页。
- c、杨琮《福建宋元壁画墓初步研究》，《考古》1996年1期，75-81页。
- [39] 这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当地有较为发达的瓷器生产，二是从泉州地区输往内地存在瓷器运输上很大的不便利。因此，这里可以说泉州沿海地区瓷器产品不会销往内地。
- [40] a、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11月。
- b、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1-18页。
- [4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试掘组《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2卷2期，164-172页。
- [42] a、泉州市文管办、泉州市博物馆《泉州法石古渡口遗址清理》，《福建文博》2003年1期，58-60页。
- b、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泉州市丰泽区文化发展中心《泉州文兴、美山古码头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3年2期，41-59页。
- [43] a、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瓷》，東京，1975年6月；（日）長谷部樂爾、今井敦編著《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第一二卷，東京，平凡社，1995年9月。
- b、（日）龜井明德、矢部良明《宋代の輸出陶磁》，（日）長谷部樂爾編集《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学館，1977年，266-292、294-296頁。
- c、（日）阪井隆夫《遺品に基づく：貿易古陶磁史概要》，京都，株式會社京都書院，1989年9月。
- d、（日）龜井明德《日本出土の描文青瓷の新分類》，載龜井明德編著《福建省古窯跡出土陶磁器の研究》，東京，文明堂，1995年9月，24-34頁。
- e、荻嵐《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 f、（日）榑崎彰一著、杨琮、范培松译《日本出土的宋元陶瓷和日本陶瓷》，《江西文物》1990年3期，109-115页。
- g、（日）佐佐木达夫著、李天送译《日本海的陶瓷贸易》，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6月，114-137页。
- h、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155-172页。
- i、堺市博物館編集《博多と堺》，大阪，堺市博物館發行，1993年4月。
- [44] a、（菲）莊良有（Rita Ching Tan）：*Song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在菲律賓發現的宋瓷），陳康順編《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317-344頁。
- b、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White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93.

[45] 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Various Uses and Origins*, Secon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1981), Jakarta,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0.

[46] a、(日)坂井隆《東南アジア群島部の陶磁器消費者》,《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3月,159-249頁。

b、(日)龜井明德《東南アジアの陶磁遺跡出土地名》(第一稿),《貿易陶磁の研究》,第9集,1989年,161-206頁。John, S, Guy: *Ceramics Excavation Sites in Sou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Gazetteer, 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9, 1989, pp.161-206.

c、John S. Guy: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With a Catalogue of Chinese, Vietnamese and Thai Wares in Australian Collection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7] a、俞伟超《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年2期,6-11頁。

b、粟建安《福建水下考古工作回顾》,《福建文博》1997年2期,19-22、46頁。

c、崔勇《广东水下考古回顾与展望》,《福建文博》1997年2期,23-27頁。

[48] a、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10期,1-29頁;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b、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北礁发现的古代陶瓷器——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续编》,《文物资料丛刊》(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7月,151-168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6年9期,9-27頁。

c、何纪生《遗留在西沙群岛的古代外销陶瓷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7月,132-136頁。

d、蒋迎春《西沙群岛文物普查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7月14日1版。

e、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49] a、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2期,28-31頁。

b、張威《南海沉船の発見とその》,中國・南海沉船文物を中心とする《はるかなる陶磁の海路展(圖録)——アジアの大航海時代》,東京,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東京企画第一部編集発行,1993年,25-28頁,29-42頁図録。

c、任卫和《广东台山宋元沉船文物简介》,《福建文博》2001年2期,80-84頁。

[50] a、粟建安《福建陶瓷外销源流》,《文物天地》2004年5期,12-22頁。

b、粟建安《从水下考古的发现看福建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2001年1期,98-106頁。

[51] 吴春明著《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

[52] a、叶文程《福建晋江县古外销陶瓷探讨》,载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会刊《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1月,84-89頁。

b、林文明《泉州陶瓷外销问题的探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7月,71-79頁。

c、李知宴、陈鹏《泉州的海外贸易和陶瓷输出》,《景德镇陶瓷》1983年总第21期(《中国古陶瓷研究

專輯》第一輯), 141 - 149 頁。

d、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的品种和釉色》，《福建文博》1990年1期(15)，72 - 78页。

[53] 叶文程、苏垂昌、黄世春《晋江磁灶窑的发展及其外销》，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11月，61 - 65页。

[54] “军持”的生产中以泉州德化窑居多，类型多样，时间也较长，宋、元、明、清均有烧造。这里器物一般被看作是专门外销的产品。泉州沿海的磁灶窑、南安窑等地也有生产，尤其是磁灶窑，有黑釉、素胎、酱釉、白釉、绿彩釉等。

a、李知宴、黄宝玲《关于军持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7月，148 - 156页。

b、徐本章、叶文程《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军持”》，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7月，157 - 162页。

c、L. Katherine Lane, Chinese Kendi Produced for the South East Asian Market (《为东南亚市场生产的中国军持器皿》)，载郭景坤主编《古陶瓷科学技术5——200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ISAC'02)》，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472 - 477页。

[55] 越窑产品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已经远销海外，主要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西亚甚至非洲东海岸一带。

a、李知宴《从唐代陶瓷的发展看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总第7期，53 - 61页。

b、苏垂昌《唐五代中国古陶瓷的输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2期，93 - 101页。

c、林士民著《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56] 揭前注，西沙群岛考古调查。

[57] 揭前注，南海沉船考古调查。

[58] a、陳信雄著《澎湖宋元陶瓷研究概况》，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85年11月。

b、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澎湖內垵、中屯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年8月。

c、陳信雄《遺留在澎湖的宋元和五代外銷陶瓷》，載陳康順編《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253 - 272頁。出土有南宋时期泉州陶瓶以及福建仿龙泉青瓷，据统计，这些出土瓷片中有85%来自福建，12%来自浙江。文中认为瓷器由泉州出口，经由澎湖到南洋的澎湖航线，到达菲律宾、爪哇、沙捞越(加里曼丹)、苏门答腊、马来西亚一带。

d、劉良佑《從台澎出土之部分貿易瓷標本探討其相關窯口的幾個問題》，載陳康順編《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225 - 252頁。文中提及澎湖中屯、台南安平遺址出土瓷片。

e、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金門地區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2年9月。

f、陳信雄著《宋元海外發展史研究》，台南，甲乙出版社，1992年6月。

[59] 揭前注，日本出土中国陶瓷，主要有博多、镰仓、福冈等濒海城市遗址，出土数量极大，种类丰富。

[60] a、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1975年6月；（日）長谷部樂爾、今井敦編著《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第一二卷，東京，平凡社，1995年9月。

b、（日）龜井明德、矢部良明《宋代の輸出陶磁》，（日）長谷部樂爾編集《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学館，1977年，266-292、294-296頁。

c、（日）阪井隆夫《遺品に基づく：貿易古陶磁史概要》，京都，株式會社京都書院，1989年9月。

d、（日）龜井明德《日本出土の描文青瓷の新分類》，載龜井明德編著《福建省古窯跡出土陶磁器の研究》，東京，文明堂，1995年9月，24-34頁。

e、荃嵐《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f、（日）檜崎彰一著、杨琮、范培松译《日本出土的宋元陶瓷和日本陶瓷》，《江西文物》1990年3期，109-115頁。

g、（日）佐佐木达夫著、李天送译《日本海的陶瓷贸易》，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6月，114-137頁。

h、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155-172頁。

[61] a、（日）坂井隆《東南アジア群島部の陶磁器消費者》，《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3月，159-249頁。

b、（日）龜井明德《東南アジアの陶磁遺跡出土地名》（第一稿），《貿易陶磁の研究》，第9集，1989年，161-206頁；John, S. Guy: *Ceramics Excavation Sites in Sou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Gazetteer, 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9, 1989, pp.161-206.

c、John S. Guy: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With a Catalogue of Chinese, Vietnamese and Thai Wares in Australian Collection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d、魏约翰著、苏怡和译《东南亚的东方贸易陶瓷》，61-67頁；苏来曼著、傅振伦译《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68-75頁。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6月。

e、韓槐准著《南洋遺留の中國古外銷陶磁》，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1月。

f、（日）青柳洋子著、梅文蓉译《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2期，104-107頁。

[62] 堺市博物館編集《博多と堺》，大阪，堺市博物館發行，1993年4月。

[63] （日）長谷部樂爾、今井敦編著《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第一二卷，東京，平凡社，1995年9月。

[64] 根津美術館學芸部編集《甦る鎌倉——遺跡発掘の成果と伝世の名品》，東京，根津美術館發行，1996年8月。

[65] a、（菲）莊良有（Rita Ching Tan）: *Song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在菲律賓發現的宋瓷），載陳康順編《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317-344頁。

b、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White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93.

c、徐本章《试谈澎湖航线与中菲陶瓷贸易》，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代

陶瓷的外销——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11月，126-130页。

d、陈台民《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及其他》，31-34页；艾迪斯著、曹今予译《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35-48页；富斯著、许其田译《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瓷》，48-57页；费·兰达·约卡诺著、韩振华译《中菲贸易关系上的中国外销瓷》，58-61页。以上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6月。

[66] a、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Various Uses and Origins*, Secon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1981), Jakarta,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0.

b、Sumarah Adhyatman: *The Usage of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in Indonesia*(中国古代贸易瓷在印尼的用途), 载陈康顺编《中国古代贸易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501-512页。

[67] a、Bhujjong Chandavij 著、李培俊译《中国陶瓷在泰国》，载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中国古陶瓷研究——'82第一届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303-305页。

b、Bhujjong Chandavij: *Thai Architecture with Chinese Ceramic Decoration*(中国陶瓷对泰国建筑装饰之影响), 陈康顺编《中国古代贸易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297-316页。

[68] a、Othman B. M. Yatim 著、李培俊译《马来西亚发现的商业陶瓷》，载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中国古陶瓷研究——'82第一届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409-411页。

b、苏来曼著、傅振伦译《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6月，68-75页。

c、郑德坤著、李宁译《沙捞越考古》，载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69] (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此书以日文原著为底本《陶瓷の路》(岩波新书，1978年1月)，至少有四个中文译本：文物出版社李锡经、高喜美译本，庄景辉、胡金定、黄东毅译本《陶瓷之路——访东西文明的接点》(1981年7月，即《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内部刊印本)，天津人民出版社胡德芬译本(《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1983年)，台北宋念慈译本(《陶磁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80年2月)。这里采用文物出版社译本。

[70] a、(日)三上次男著、秦大树译《中国陶瓷在埃及中世纪遗址中的发现》，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173-178页。

b、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0月。

c、(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

[71] 澎湖在元代“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载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颐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5月)，“澎湖”条，13页。

a、陈信雄《澎湖宋元陶瓷研究概况》，澎湖县立文化中心，1985年11月。

b、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澎湖內垵、中屯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年8月。

c、陈信雄《遺留在澎湖的宋元和五代外銷陶瓷》，载陈康顺编《中国古代贸易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253-272页。出土有南宋时期泉州陶瓶以及福建仿龙泉青瓷，据统计，这些出土瓷片中有85%来自福建，12%来自浙江。

d、劉良佑《從台澎出土之部分貿易瓷標本探討其相關窯口的幾個問題》，載陳康順編《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225-252頁。文中提及澎湖中屯、台南安平遺址出土瓷片。

e、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金門地區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2年9月。

f、劉良佑《從澎湖出土之瓷器殘片探討其年代及起源諸問題》第一部分《青瓷與青白瓷》，載李家治、陳顯求主編《古陶瓷科學技術1——1989年國際討論會論文集（ISAC'89）》，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7月，462-468頁。

[72] a、徐本章《試談澎湖航線與中菲陶瓷貿易》，載中國古陶瓷研究會、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1987年晉江年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11月，126-130頁。

b、陳信雄《遺留在澎湖的宋元和五代外銷陶瓷》，載陳康順編《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年，253-272頁。文中認為瓷器由泉州出口，經由澎湖到南洋的澎湖航線，到達菲律賓、爪哇、沙撈越（加里曼丹）、蘇門答臘、馬來西亞一帶。

c、陳信雄著《宋元海外發展史研究》，台南，甲乙出版社，1992年6月。

d、傅宗文《宋元時期的閩台交往與東洋航線》，《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3期，104-110頁。文中論述了刺桐港（泉州）與“東西洋”的交往航線，其中東洋航線為“泉州-澎湖-菲律賓”。

[73] a、泉州港與古代海外交通編寫組《泉州港與古代海外交通》，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

b、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

c、李東華著《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1月。

d、Billy K.L.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2000.

e、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1.

[74] 同上注。

[75] 孫光圻《古代中國通向阿拉伯的海上航路及其沿革》，《中國航海》1987年1期，55-65頁。

[76] 吳春明著《環中國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與船貨》，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

[77] a、唐星煌《漢晉間中國陶瓷的外傳》，《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3期，106-110頁。

b、唐星煌《漢唐陶瓷的傳出和外銷》，吳錦吉、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第一輯，1996年12月，137-148頁。

[78] a、蘇垂昌《唐五代中國古陶瓷的輸出》，《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2期，93-101頁。

b、李知宴《從唐代陶瓷的發展看中國和亞非國家的關係》，《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5年總第7期，53-61頁。

- [79] a、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1期，20-24页。
- b、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6期，65-74页。
- c、李知宴《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瓷器的发展和外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总第17期，30-36页。
- d、(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
- e、欧志培《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12月，229-243页。
- f、叶文程《试论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国家和地区》，《福建文博》1989年1、2期，104-110、113页。
- [80] 叶文程、丁炯淳《中国古陶瓷畅销国外的原因》，《福建文博》1991年1、2期，91-96页。
- [81] 齐东方著《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
- [82] a、(日)三上次男著、魏鸿文译《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与越州窑青瓷》，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6月，42-73页。
- b、(日)三上次男著、董希如译《唐末作为贸易陶瓷的长沙铜官窑瓷》，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6月，74-78页。
- c、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10月。
- [83] a、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陶瓷器》，(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十三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所，2002年，1-60頁。
- b、李知宴《从唐代陶瓷的发展看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总第7期，53-61页。
- [84] 鄭學稼著《日本史》，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77年。
- [85] a、(英)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10月。
- b、何平著《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
- c、王任叔著《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
- [86] 埃尔·法西主编《非洲通史》第3卷(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12月；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4卷(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8月。
- [87] a、这些资料可参考宋、元人对海外国家的认识，宋赵汝适《诸蕃志》(杨博文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9月)、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颀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5月)、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夏鼐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等都作了描述，包括其地、其居、其俗、其用等各方面所见所闻，是我们研究当时这些地区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 当时外国人到中国的游记中对所经过地区的生活习俗、社会状况等也作了记载，包括《马可波罗行记》(意大利人，法国的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月新1版)、《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鄂多立克东游录》(意大利人，何高济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12月，27-96页）等。

b、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Various Uses and Origins*,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Secon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1981),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Jakarta, 1990. 在介绍陶瓷之前，书中谈论了印度尼西亚相关的历史背景和生活习俗。

[88] a、陈进海编著《世界陶瓷艺术史》，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5年4月。

b、(日)相賀徹夫編集《世界陶磁全集16·南海》，小学館，1984年；(日)相賀徹夫編集《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小学館，1986年。

[89] (日)後藤茂樹編集《世界陶磁全集2·日本古代》，東京，小学館，1979年。(日)相賀徹夫編集《世界陶磁全集3·日本中世》，小学館，1977年。

[90] 制瓷技术需要窑炉、窑具、温度火候的控制等方面综合考虑(参看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阿拉伯地区的大食生产有波斯釉陶，日本所产亦属陶器。

[91] a、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1期，20-24页。

b、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6期，65-74页。

c、李知宴《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瓷器的发展和外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总第17期，30-36页。

d、(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

e、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10月。

[92] 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

[93] 叶文程、芮国耀《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7年2期，1-11页。

[94] a、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2期，28-31页；張威《南海沉船の発見とその》，中國·南海沉船文物を中心とする《はるかなる陶磁の海路展(図録)——アジアの大航海時代》，東京，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東京企画第一部編集発行，1993年，25-28頁，29-42頁図録；任卫和《广东台山宋元沉船文物简介》，《福建文博》2001年2期，80-84页。

b、吴春明著《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

c、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2期，245-254页、图版一至十四；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3期，112-118、121页；贡昌《略论南朝鲜新安沉船出土钧窑系瓷器的窑口》，《考古》1988年6期，567-570页；(韓)文化公報部管理局《新安海底遺物》，三星文化印刷社，1984年；(韓)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高麗書籍株式會社印刷，1988年12月；(韓)郑良谟著、程晓中译《新安海底发现的陶瓷器的分类与有关问题》，《海交史研究》1989年1期，94-98页。

d、马文宽《福斯塔特出土中国瓷器的窑口与年代》，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5月，281-291页；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1期，79-91页。

f、裴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95]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

- [96] a、(日)桑原鹭藏著、冯攸译《中国阿刺伯海上交通史》(原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
- b、(日)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7月。
- c、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4月影印1937年1月第1版。
- d、章巽著《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12月第2版。
- e、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6月。
- [97] 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载《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报》(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1月,105-129页。
- [98] 倪尔爽《南宋时温州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海交史研究》1998年2期(34),35-42页。
- [99] 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5月。
- [100] a、庄景辉《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79-98页;《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99-110页。均载庄景辉著《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 b、黄纯艳著《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
- c、李東華著《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1月。
- d、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1.
- [101]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
- [102] a、庄为玘《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载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367-379页。
- b、庄景辉《泉州子城址考》,《福建文博》1987年2期(11),159-164页。
- c、庄景辉《泉州罗城址考》,载庄景辉著《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19-36页。
- [103] a、[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八载:初设有广州、明州、杭州,后“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詔泉州增置市舶”(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3367页。据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
- b、孔宝康《我国古代市舶制度初探》,《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1-4页。
- c、[宋]朱彖撰《萍洲可谈》卷二载:“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船舶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李伟国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25页)。
- d、余思伟《广州市舶司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83年5期,71-85页。
- [104] a、[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船舶……凡大食、古邏、閩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賓同隴、沙裏亭、丹流眉,立通貨易,以金銀、緞錢、鉛錫、雜色帛、精麗瓷器,市易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鑲鐵、鼈皮、瑇瑁、瑪瑙、車渠、水晶、番布、烏櫛、蘇木之物”(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3364页。据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

b、连心豪《略论市舶制度在宋代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45-51页；陈苍松《市舶管理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从宋代广州和泉州的海外贸易谈起》，《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52-56页。

[105] a、庄景辉《泉州宋代祈风石刻考释》，《江西文物》1989年2期，89-95、58页。

b、吴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年11期，33-47页。

c、李玉昆《试论宋元时期的祈风与祭海》，《海交史研究》1983年总第5期，65-70、104页。

[10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载：“绍兴十四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璠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3375页。据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

[107] 关于“蕃坊”，广州的记载较为详尽，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李伟国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27页）。泉州蕃坊大抵同于此。

a、（日）桑原鹭藏著、冯攸译《中国阿刺伯海上交通史》（原《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第1版。

b、廖大珂《谈泉州“蕃坊”及其有关问题》，《海交史研究》1987年2期，78-84页。

c、陈达生《论蕃坊》，《海交史研究》1988年2期，67-74页。

[[08] a、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银川、福州，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

b、陈达生《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祈风与祭海之踪迹》，《海交史研究》1986年1期，97-100页。

[109] a、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b、CHEN Dasheng（陈达生）：*Iranian Impact on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a in the 7th - 15th Centuries: A Study on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从考古文物中看7-15世纪伊朗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影响），《海交史研究》1999年2期，98-116页。

[110] a、泉州一批外国银币的出土即是对外贸易繁盛的佐证，参看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泉州地区出土的五批外国银币》（《考古》1975年6期，373-379页、图版十一、十二）。

b、元代泉州港在对外贸易港口中地位显著，其他诸港各项条例、税法等均“依泉州见行体例”，参考《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户部》卷之六《市舶》（元刊刻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76年12月）。

[111] 孙光圻《宋代航海技术综论》，《中国航海》1984年2期，69-81页。

[112] a、席龙飞、杨燧、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

b、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第六、七章，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132-219页；王冠倬《从文物资料看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总第5期，17-33页。

c、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

[113]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11月。

- [114] 李玉昆《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海交史研究》1998 年期，58 - 67 页。
- [115] 李玉昆《宋元时期泉州的珠宝贸易》，载陈世兴主编《泉州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 4 月，347 - 358 页。
- [116] a、刘迎胜著《丝路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1 月。
- b、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 2 版。
- c、(日)三杉隆敏著、白英译《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 年 6 月，92 - 109 页。
- d、朱非素《南海“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浅析》，载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年 4 月，499 - 512 页。
- e、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 年 1 月。
- [117] (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9 月。
- [118] 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9 月；《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二)，2003 年 10 月。

## **A Study on the Export Ceramics from the Sung to Yuan Dynasties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Quanzhou**

Meng Yuan-zhao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ceramics boomed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Quanzhou, Fujian. They were found in many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However, it was so few in the local sites except the waste chinaware from the kiln sites. Hereby, they belonged to trade ceramics and mainly exported to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The sort of export ceramics included bowls, plates and vases. A large quantity of export ceramics resulted from foreign demand, imitating famous kilns and the advantage of Quanzhou Port.

**Keywords:**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Coastal region of Quanzhou, Ceramics, Export

收稿日期: 2006 年 4 月 12 日

作者简介: 孟原召,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05 级博士研究生, 主修陶瓷考古、历史时期考古。

